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汉英“上/下”和Up/Down的隐喻意义对比研究

王仲尧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6日

摘 要

隐喻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概念隐喻理论主张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 是人类认知的基石。空间隐喻是认知隐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许多抽象概念构建的基础。方位词“上/下”和up/down作为两对基本空间方位范畴, 其空间意义通过隐喻投射到数量、时间、状态、社会地位等非空间域, 形成丰富的隐喻表达。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 借助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和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语料库(CCL), 对汉英“上/下”与up/down的隐喻意义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 汉英两种语言中“上/下”和up/down均存在大量的空间方位隐喻, 主要投射至时间域、数量域、状态域、社会地位域、程度域和道德域等目标域; 汉英方位隐喻既存在基于共同身体体验的认知共性, 也存在由文化差异导致的个性差异; 其隐喻认知模式可归纳为基于身体体验相似性的隐喻认知模式和创造相似性的隐喻认知模式两类。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上/下, Up/Down, 隐喻意义, 汉英对比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s of “Shàng/Xià” in Chinese and “Up/Down” in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Zhongyao Wa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July 5, 2026; accepted: August 12, 2026; published: August 26, 2026

Abstract

Metaphor is ubiquitous in our lives.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holds that metaphor is a mode of thought and a cornerstone of human cognition. Spatial metaphor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any abstract concepts. As two pairs of basic spatial-orientational categories, the Chinese terms “shàng/xià” and the English terms up/down extend their spatial meanings metaphorically into non-spatial domains such as quantity, time, state, and social status, thereby giving rise to a rich variety of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study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s of “shàng/xià” in Chinese and up/down in English, drawing on data from the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COCA) and the corpus develop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at Peking University (CCL). The findings show that both “shàng/xià” and up/down exhibit a large number of spatial-orientational metaphors, which are primarily mapped onto target domains such as time, quantity, state, social status, degree, and morality. Chinese and English orientational metaphors display both cognitive commonalities grounded in shared bodily experience and language-specific differences arising from cultural variation. Their metaphorical cognitive pattern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those based on similarities in bodily experience and those based on created similarities.

Key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Shàng/Xià, Up/Down, Metaphorical Meaning, Chinese-English Contrastive Stud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隐喻不仅是修辞手段，更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Lakoff 和 John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隐喻的本质是通过一个概念域来理解另一个概念域，其中方位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植根于人类最直接的身体经验——空间方位感知[1]。束定芳也指出，现代隐喻研究已经超越传统修辞学范围，进入语言、认知和文化相互关联的研究层面[2]。空间概念是人类最早习得、最为基础的概念系统，诸多抽象概念(如时间、数量、情绪、社会地位等)都需要借助空间方位隐喻才能得以构建和表达。汉语的“上/下”与英语的“up/down”作为两对最基本的垂直空间方位词，不仅承载着明确的空间指示功能，更通过隐喻映射广泛渗透于非空间认知域，形成丰富的隐喻表达网络。因此，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对比分析汉英垂直方位隐喻，既有助于揭示人类认知的普遍规律，也有助于阐明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隐喻表达的差异化机制。

已有研究已从多个角度讨论汉英“上/下”与 up/down 的方位隐喻问题。蓝纯较早从认知角度考察汉语和英语空间隐喻，指出空间经验在两种语言抽象概念建构中均发挥重要作用[3]。肖家燕以《红楼梦》及其英译本为材料，分析“上-下”空间隐喻的优先概念化及其翻译策略，说明汉语“上/下”空间隐喻在跨语言转换中并不总能获得完全对等的英语表达[4]。刘晓宇、刘永兵基于英汉语料库比较“上”“下”与 up、down 的隐喻目标域，进一步揭示二者在状态、数量、时间、程度、范围和社会地位等领域中的映射共性与分布差异[5]。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已从认知理论、翻译实践和语料库比较等角度揭示了汉英“上

/下”与 up/down 方位隐喻的共性与差异,但对其差异背后的历史语义证据、文化认知模型和社会制度动因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框架,借助 COCA 和 CCL 两个语料库,对汉英“上/下”与 up/down 的隐喻意义进行系统对比研究。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不仅关注二者在时间、数量、状态、社会地位、程度和道德等目标域中的映射共性与差异,而且进一步从语言类型特征、文化认知模型、历史社会制度以及认知惯性与社会变迁的互动等方面解释其差异形成的认知动因。通过这一分析,本文旨在更清楚地呈现汉英垂直方位隐喻在具身经验、文化规约和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从而为汉英空间方位隐喻对比研究提供进一步的语料支持和解释补充。

2. 方位隐喻

传统修辞学将隐喻视为一种语言层面的修辞手段,认为其主要功能在于增强表达的生动性与形象性。然而,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这一认识。Lakoff 和 John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系统提出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指出隐喻本质上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方式——人们借助具体、熟悉的源域来理解和建构抽象、复杂的目标域,其机制是跨概念域的系统性映射[1]。这一理论突破将隐喻研究从语言表层引向认知深层,揭示了抽象概念如何以具身体验为根基得以组织和表达。Yu 结合汉语材料指出,概念隐喻不仅表现为个别词语的意义变化,而且系统参与了汉语抽象概念的组织与表达[6]。

概念隐喻理论将隐喻划分为结构隐喻、本体隐喻和方位隐喻三种类型。其中,方位隐喻因其与身体经验的直接关联而具有特殊地位。人类生活在重力环境中,从出生起便持续体验“上(up)/下(down)”的垂直空间关系,这种重复的身体经验使垂直图式逐渐超越物理空间意义,成为组织抽象概念的认知资源。Johnson 的意象图式理论进一步揭示,人类在长期与客观世界互动中形成垂直图式等稳定的经验结构,这些结构不仅包含空间方位信息,更蕴含着方向性、力量关系与价值评价等认知要素[7]。Grady 提出的初级隐喻理论进一步说明,一些基本隐喻源于日常经验中反复出现的感知与概念共现关系[8]。Yu 对汉语概念隐喻的研究也表明,身体经验广泛参与汉语时间、情绪、数量和社会关系等抽象概念的建构[6]。正是基于这种具身化的认知机制,“上/下”得以系统地映射到情绪、数量、社会地位、道德品质等多个抽象领域,形成诸如 HAPPY IS UP; SAD IS DOWN; MORE IS UP; HIGH STATUS IS UP; GOOD IS UP 等跨语言普遍存在的概念隐喻。汉英两种语言中“情绪高涨/精神振奋”与 cheer up/in high spirits、“身居高位”与 rise to power、“高风亮节”与 high moral standards 等丰富表达,正是这一认知共性的语言体现。

方位隐喻的系统性与复杂性构成其认知运作的两大重要特征。Boers 以 up-down 等空间维度为对象,指出空间方位意义能够沿着相互关联的认知路径扩展到数量、状态、社会关系和价值评价等抽象领域[9]。其系统性体现在同一垂直图式能够持续影响多个目标域,并形成从核心隐喻到次级隐喻再到具体表达的层级网络。例如,GOOD IS UP 作为上位隐喻,统摄 HEALTH IS UP、HAPPINESS IS UP、SUCCESS IS UP 等下位隐喻,进而衍生出“精神振奋”、rise above difficulties 等具体语言表达。方位隐喻的复杂性则表现为一源多域的映射格局、不同目标域之间的交叉互动以及隐喻意义的动态演进:同一个“上”既可表示数量增加(价格上涨)、地位提升(升职),也可表达情绪好转(高兴起来)与能力增强;“地位高”往往与“力量强”“价值高”“道德优越”等概念相互关联,形成复合隐喻结构。此外,方位隐喻并非静态的认知结构——汉语中“上网”“上传”与英语中 upload、online 等表达的涌现,表明垂直空间隐喻正随着数字时代的社会实践不断向新领域扩展。

值得注意的是,方位隐喻的形成既根植于人类共同的身体经验与意象图式,也深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塑造。Kövecses 指出,概念隐喻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中既可能表现出一定的普遍性,也会在具体映射、语

言表达和文化内涵等方面产生变异[10]。Yu 结合汉语材料进一步说明, 身体经验与文化模式共同参与语言意义和概念系统的形成[6]。共同的身体结构与生存环境决定了汉英两种语言在方位隐喻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而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则导致两者在具体映射路径、语义扩展方向与文化内涵上呈现差异。汉语中“上级”“上朝”“上奏”等表达承载着中国传统等级制度的深刻烙印, 而英语中 *move up the corporate ladder* 则折射出现代组织结构和职业发展的认知模式。这一辩证关系表明, 方位隐喻是具身认知与文化认知共同作用的产物。身体经验为隐喻映射提供了认知基础与共性框架, 文化经验则推动了隐喻意义的进一步扩展、细化与分化。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交织作用下, “上/下”与 *up/down* 逐渐形成复杂而系统的隐喻意义网络, 成为人类理解抽象概念不可或缺的认知工具。对其进行汉英对比研究, 不仅能够揭示方位隐喻的具身认知根源与系统运作规律, 更有助于深入考察语言、认知与文化之间的互动机制, 为后续的隐喻意义网络分析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3. 汉英方位隐喻的异同——以“上(Up)/下(Down)”为例

前文已将概念隐喻理论与意象图式理论作为分析框架, 并厘清了方位隐喻的复杂性与系统性特征。在此基础上, 本节转入具体的跨语言对比, 聚焦汉英“上/下”与 *up/down* 在数量、状态、社会地位、时间、程度及道德等核心目标域的隐喻投射。语料主要取自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和北京大学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 通过检索“上/下”“*up/down*”的高频搭配与隐喻用法, 筛选出典型语句, 并按目标域归类后进行定性对比。分析显示, 两种语言既因共享的身体经验与垂直空间图式而呈现出深层认知共性, 也因文化模型与认知方式的差异而表现出一定分歧。下面先就共性展开分析, 再就差异进行讨论。语料库方法能够将隐喻研究建立在自然发生的语言材料之上, 并有助于考察隐喻表达的实际分布、搭配特征和常规化程度。

3.1. 汉英“上/下”“Up/Down”隐喻映射的共性

人类直立行走的身体构造与重力场中无处不在的物理经验, 为垂直方位隐喻提供了跨语言共享的认知根基[7][8]。向上运动需要主动克服重力, 因而在经验中反复与“努力”“活力”“优势”“控制”等正向概念相关联; 向下运动则顺应重力, 与“放松”“衰退”“劣势”“失控”等负向概念形成自然联系。相关研究还表明, 权力和社会地位概念能够与较高的垂直空间位置形成认知联系[11]。Lakoff 和 Johnson 还指出, 方位隐喻并非任意性的语言装饰, 而是系统性地植根于人类最基本的身体体验, 并以意象图式的形式存储于长时记忆之中, 构成理解和构建抽象概念的认知基础[1]。Johnson 进一步强调, 垂直图式作为最重要的意象图式之一, 不仅包含“高-低”的空间结构, 还内在地蕴含了力量关系、方向性和价值评价等认知信息[7]。正是基于这一共享的体验基础和认知图式, 汉英两种语言均将“上/*up*”映射至积极、增量、优势等概念域, 将“下/*down*”映射至消极、减量、劣势等概念域, 并在时间、数量、状态、社会地位、程度及道德六个核心目标域形成高度系统的隐喻对应。以下就其共性展开分析。

3.1.1. 映射方向的经验基础与一致性

汉英两种语言在“上/*up*”与“下/*down*”的隐喻投射中, 均遵循着由身体经验所塑造的同一方向性逻辑: 向上与积极、增量、优势、较早时间等概念域形成稳定的认知关联, 向下则与消极、减量、劣势、较晚时间等概念域相对应。这一方向性在时间、数量、状态、社会地位、程度及道德等多个抽象域中保持一致。汉语“上涨”与英语 *rise* 同表数量增加, 汉语“情绪低落”与英语 *feel down* 同表情绪消沉, 汉语“升迁”与英语 *climb up the corporate ladder* 同表地位提升, 汉语“高尚”与英语 *high moral standards* 同表德行高洁。这种方向上的同构性并非源于语言间的直接接触或借用, 而是植根于人类共通的垂直空间体验——向上与优越、向下与劣等之间经验关联的普遍性。时间概念的空间化同样体现了具体空间经验

对抽象概念建构的作用。Boroditsky 在汉英时间认知比较研究中讨论了汉语使用垂直空间关系组织时间概念的特点[12]。因此, 汉英语言中以空间方向表达时间顺序的现象, 可以视为垂直空间图式向时间域投射的具体表现。例如:

- (1) a. 上世纪冷战时期形成的多边安全框架, 在下世纪多元力量格局中或将面临根本性的重构与调适。
- b. 上一轮技术革命所释放的生产力红利尚未完全兑现, 下一轮人工智能浪潮便已悄然改写产业竞争的底层逻辑。
- (2) a. The upcoming transition to a carbon-neutral economy, albeit fraught with infrastructural bottlenecks, promises to redefine the geopolitical leverage of resource-exporting nations.
- b. These intricate common-law principles, meticulously handed down through centuries of judicial reasoning, continue to shape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temporary contract disputes.

例(1a)和例(1b)中“上世纪/下世纪”“上一轮/下一轮”呈现了汉语以上表先、以下表后的时间方向; 例(2a)中 *upcoming* 以“上行”喻指未来临近, 例(2b) *handed down* 则以“下行”喻指历史传递, 两者方向相反却共享同一垂直时间图式, 印证了方向一致性的跨语言存在。

3.1.2. 目标域覆盖的类型学共性

从跨语言比较的视角来看, 汉英两种语言均将垂直空间图式系统性地投射至一组高度相似的核心抽象领域。时间、数量、情绪、健康、意识、社会地位、品质程度、道德判断等认知域, 在两种语言中均通过“上/up”与“下/down”发展出对称而丰富的表达手段。这一覆盖面的一致性在跨语言比较中并不常见, 其深层原因在于上述概念域均与人类基本的身体经验和文化实践密切相关: 数量的增减在物理世界中与高度的升降共现, 情绪与健康状态的起伏直接外显于身体姿态, 社会等级的划分在仪式与建筑中普遍呈现为垂直排列, 道德评价则与“直立”与“卑躬”的身体隐喻深度绑定。这种核心目标域的一致性表明, 垂直方位隐喻是人类组织抽象经验的一套基本认知工具。例如:

- (3) a. 该公司去年利润大幅攀升, 而竞争对手的业绩却持续下滑。
- b. 他因品行高尚而广受尊敬, 那些散布谣言者则被斥为下作可鄙。
- (4) a. Consumer prices have gone up sharply this quarter, yet real wages have remained down.
- b. She moved up the political ranks rapidly in the post-war era, while her rivals were eventually forced down into obscurity.

例(3a)~例(3b)与例(4a)~例(4b)分别覆盖了数量域(利润攀升/业绩下滑)、道德域(高尚/下作)、经济域(*prices have gone up*)和社会地位域(*were forced down into obscurity*), 展示了两种语言在多个抽象域中同步调用垂直隐喻的普遍格局。

3.1.3. 语义扩展的相似性与动态性

汉英垂直方位词均表现出较强的语义扩展潜力, 能够在既有隐喻框架内不断衍生新的用法, 并适应社会经验变化所催生的新兴概念领域。在传统用法层面, 英语以 *up/down* 构成大量短语动词(*pick up*、*break down*、*turn up* 等), 汉语同样以“上/下”参与大量复合词和惯用表达构造(“看上”“放下”“赶上”等), 体现了共时层面的构词能产性。更为值得关注的是, 两种语言都利用这一隐喻机制向现代生活的新兴领域延伸: 现代汉语中的“上网”“上传”“上线”“上云”与英语中的 *upload*、*online*、*download*、*cloud-based* 等表达, 均将垂直空间图式投射至数字信息与网络空间领域; 汉语“上热搜”“排名靠前”与英语 *trending up*、*top-ranked* 等新近用法, 则进一步表明该隐喻机制在现代语境中仍保持开放性和动态适应能力。这种语义的持续扩展说明, 垂直方位隐喻并非静态的认知遗产, 而是具有活跃生产力的概念建构资源。例如:

- (5) a. 用户只需将文件上传至云端,即可随时在线访问和编辑。
b. 该话题迅速登上热搜榜首,引发全网广泛讨论与二次传播。
- (6) a. You can upload the documents to the cloud and access them online anytime.
b. The hashtag is trending up rapidly, sparking heated debates across multiple social platforms.

例(5a)与例(6a)中的“上传/upload”“在线/online”和例(5b)与例(6b)中的“登上热搜/trending up”均是将垂直空间图式延伸至数字信息领域的新兴用法,展示了该隐喻系统在当代语境下持续扩展的认知能产性。

综上所述,汉英“上/下”与 up/down 在映射方向的经验基础与一致性、目标域覆盖的类型学共性以及语义扩展的相似性与动态性等方面表现出多层面的共性特征。这些共性印证了概念隐喻理论关于体验普遍性的主张,人类共同的身体结构与物理环境为抽象思维提供了超越个体语言的认知基础,同时也揭示了垂直空间图式在两种语言组织中发挥着普遍而活跃的认知功能。当然,共性之外亦存在差异,这将在后文进一步讨论。

3.2. 汉英“上/下”与 Up/Down 隐喻映射的差异

前文指出,汉英两种语言在“上/up”与“下/down”的隐喻运用中表现出多层面的共性,这些共性根植于人类共同的身体经验与垂直图式。然而,概念隐喻的形成并非仅由身体经验所决定。Kövecses 指出,即使不同语言社群共享相似的身体经验,其隐喻映射仍可能受到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同的语言实现[10]。不同语言社群在共同的身体经验基础上,因各自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与文化认知模式的差异,往往发展出不同不尽相同的隐喻映射路径与语义扩展方向。以下从三个维度考察汉英“上/下”与 up/down 隐喻映射的差异。

3.2.1. 社会文化制度对映射方向的规约性差异

汉英两种语言虽均以“上/up”表社会地位之高、以“下/down”表地位之低,但在具体映射路径与表达方式上呈现出明显的文化制度差异。汉语“上/下”在社会等级领域的映射深受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与等级文化的影响。“上”不仅指物理空间的高处,更承载着尊卑有序的礼制内涵:“上级”“上司”“上峰”指称权力体系中的高位者,“上朝”指臣下觐见君主,“上奏”“上书”指下级向上级呈递文书,“皇上”则以“上”直接指代最高统治者。这些表达中的“上”已超越单纯的空间方位,成为权力与尊卑等级的制度性符号。汉语中“人往高处走”的人生训诫,同样折射出社会流动向上为正向价值的文化取向。相比之下,英语中的社会地位隐喻虽然同样遵循 HIGH STATUS IS UP 的基本图式,但其具体表达更多反映现代职业组织与个体成就的认知模式: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 (攀爬公司阶梯)、move up in the world (在社会中向上走)、upward mobility (向上流动)等表达侧重于职业阶梯与个人奋斗,这类直接指涉国家权力体系和君臣礼制的制度化表达不如汉语集中。这种差异表明,共同的方位隐喻图式在进入具体社会结构时,必然受到各自历史文化制度的规约与重塑。例如:

- (7) a. 明清两代,地方官员须定期上朝向皇帝奏报政务。
b. 他出身寒门,却立志向上,深信人往高处走之理。
- (8) a. In the British civil service, officials rose up through the ranks by virtue of merit and administrative competence, rather than by noble birth.
b. While some climbed up the corporate ladder through relentless effort, others were gradually forced down into middle management by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例(7a)中的“上朝”与例(7b)中的“向上”“人往高处走”分别呈现了汉语社会地位隐喻中制度性维度与人生价值维度的双重映射；例(8b)中的 climb up the corporate ladder 则体现了英语侧重职业组织结构的特点，二者在社会制度对隐喻的规约程度上形成鲜明对照。

3.2.2. 道德评价体系中的文化偏向差异

在道德域，VIRTUE IS UP; DEPRAVITY IS DOWN 是汉英共享的基本隐喻。然而，汉语在这一领域发展出了更为细致、更具文化特色的词汇化体系。汉语中以垂直方位或高度意象为基础的道德评价词丰富而系统：“高尚”“崇高”“上流”“上品”“上乘”等多指较高的价值等级或道德境界，“低下”“卑下”“下流”“下作”“下贱”等则多指较低的价值等级或道德品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语中“上流”与“下流”这对概念。二者并非单纯的现代道德评价词，而是具有较为清晰的空间义基础和多层次的语义联系。从《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所列义项来看，“上流”既可指河流的上游，也可引申指较高的社会地位或较高的品第；“下流”则既可指河流的下游，也可引申指较低的社会地位、低下的品格或不雅的言行[13]。这些义项说明，“上/下”所标示的空间位置在长期使用中逐渐与社会等级和道德评价发生联系，并为“空间位置-社会地位-道德评价”的语义链条提供了辞书证据。正是在这一意义扩展过程中，汉语“上流/下流”逐渐从具体空间方位扩展为带有社会评价和道德评价色彩的词汇对立。这种现象并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一单一文化因素，而应理解为方位经验、社会等级观念与道德评价机制在长期语言使用中共同沉淀的结果。

相比之下，英语中虽不乏 high moral standards、noble、upright 与 low、base、mean 等对应表达，也同样体现出“上善下恶”的基本隐喻逻辑，但其道德评价义通常未像汉语“上流/下流”那样，在同一词汇对立中同时凝聚空间位置、社会等级和道德评价三重意义。因此，二者的差异不在于英语缺乏垂直道德隐喻，而在于汉语部分词汇更明显地呈现出空间义、等级义与道德义之间的历时沉淀关系。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两种语言在道德概念词汇化程度上的不同，更折射出各自文化传统中对“位”与“德”关系的不同认知侧重。例如：

(9) a. 古之君子，修身齐家，以求品德高尚，耻于卑下之行。

b. 此人表面光鲜，实则行止下流，为人所不齿。

(10) a. The philosopher emphasized that a virtuous life requires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high moral principles that lift us up rather than drag us down.

b. His base motives eventually brought him down, revealing a character far removed from anything noble.

例(9a)~例(9b)中“高尚”与“卑下”“下流”构成了汉语道德评价的上下对立体系；例(10a)和例(10b)中 high moral principles 与 base motives、anything noble 虽同样遵循“上善下恶”的隐喻逻辑，但其词汇化程度和文化独特性较汉语为弱，体现了两种语言在道德隐喻扩展深度上的差异。

3.2.3. 语法化程度与隐喻能产性的不对称

汉语“上/下”在长期使用中经历了较高度度的语法化，其隐喻能产性在多个语法层面得到充分展现。首先，汉语“上/下”大量充当动词后的趋向补语，且许多用法已高度虚化，不再表示实际的空间位移方向：“看上”表示视觉关注或喜爱，“爱上”表示情感产生，“赶上”表示追赶或及时到达，“记下”表示记录保留，“留下”表示停留或遗留，“放下”表示放置或舍弃。这些表达中的“上/下”主要承担完成体标记或结果补语的语法功能，其空间义已大幅弱化。其次，汉语还以“上/下”构成大量惯用表达：“说得上”“看不上”“放不下”“赶不上”等，其语义往往不能从字面直接推知。相比之下，英语中的 up/down 虽然同样能够构成大量短语动词(pick up、break down、turn up、slow down 等)，但其语法化程度

和虚化范围与汉语存在差异：英语短语动词中 *up/down* 的空间义通常保留得更为清晰，且其构词模式不如汉语“上/下”那般广泛渗透至情感、认知、社会互动等抽象领域。这种语法化程度的不对称，使得汉语“上/下”在隐喻意义的衍生范围和抽象层次上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例如：

(11) a. 他一眼就看上了那幅画，当即决定买下。

b. 经过几周补习，他很快赶上了班级进度。

(12) a. She picked up the basics of the language within three months.

b. The negotiations broke down due to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例(11a)中的“看上”已虚化为情感认知义，“买下”主要表达动作完成后的结果；例(11b)中的“赶上”则表示追及并达到某一进度。二者中的“上/下”均已不再单纯表示具体空间位移，而主要承担结果义或抽象化的趋向义。例(12)中 *picked up* 和 *broke down* 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语义虚化，但其空间义残留较汉语更为明显，体现了两种语言在语法化程度上的差异。

综合以上分析，汉英“上/下”与 *up/down* 在隐喻映射中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文化规约、道德评价体系、语法化程度三个方面；此外，两者在新兴领域的扩展路径上也呈现出一定差异。这些差异并不否定人类认知的普遍性基础，而是表明共同的垂直空间图式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会沿着各自的历史文化轨迹和社会认知模式发生分化性发展。正是这种共性与差异的交织，使垂直方位隐喻成为一个既能揭示人类认知普遍规律、又能深入观察语言与文化互动关系的重要窗口。

4. 汉英“上/下”“Up/Down”隐喻意义差异的认知动因

上文提到，汉英两种语言在“上/下”与 *up/down* 的隐喻运用中既呈现出基于共同身体经验的系统性共性，也表现出由文化认知模式差异所导致的多维度分化。共性源于人类共享的垂直图式与具身体验，而差异则需要在更为深层的认知与文化机制中寻求解释。从认知机制来看，其隐喻认知模式可归纳为基于身体体验相似性的隐喻认知模式和创造相似性的隐喻认知模式两类：前者依托身体与环境的直接互动，将物理经验中的垂直关系系统地投射至抽象概念域，构成了跨语言共性的认知基础；后者则在共同的身体经验之上，借助文化模式、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的介入，在不同语言社群中建立起差异化的概念关联方式。概念隐喻理论虽然强调了身体经验对隐喻建构的基础性作用，但 Kövecses 同时指出，隐喻并非在真空中运作，而是嵌置于更大的文化系统之中，并进一步将这一思想发展为“文化认知模型”(cultural cognitive models)的理论框架，认为隐喻的生成与理解不仅受制于具身体验，也受到文化模式、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10]。本章从语言类型特征、文化认知模型、历史社会制度以及认知惯性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四个维度，系统考察汉英“上/下”与 *up/down* 隐喻义差异形成的深层认知动因。

4.1. 语言类型特征对语法化路径的约束

汉英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的类型学范畴，其语法结构和构词方式对“上/下”与 *up/down* 的隐喻扩展路径产生了根本性的约束。汉语作为典型的孤立语，缺乏形态变化，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关系的主要手段。这一类型特征使得汉语中的“上/下”在长期使用中经历了较高级别的语法化，从实词性的方位名词逐渐演变为趋向补语、体标记乃至构词语素，其空间义在大量用法中已大幅虚化。Huang 和 Hsieh 也指出，现代汉语趋向补语可以由具体的空间运动意义逐渐扩展至时间、状态及非特指空间意义，这一发展过程为“上/下”向高度抽象领域扩展提供了重要的语法和语义条件[14]。例如，“看上”中的“上”已不再表示实际的空间方向，而是表示视觉焦点的转移或情感态度的产生；“放下”中的“下”也不再表示物理位置的下移，而是表示动作的完成或状态的存续。这种语法化进程为“上/下”向认知、情感、社会互动等高度抽象领域的扩展提供了句法平台和语义驱动力。

相比之下, 英语作为分析性较强的语言, 虽然也表现出一定的语法化倾向, 但其 up/down 主要仍以副词或介词的面貌出现, 其空间义在多数用法中保留得更为清晰。英语短语动词(phrasal verbs)如 pick up、break down、turn up 等虽已发生不同程度的语义虚化, 但其虚化路径和抽象化程度与汉语存在明显差异: up 在 pick up 中仍可追溯到“向上捡起”的物理意象, down 在 break down 中仍保留“由整到碎、由高到低”的空间隐喻痕迹。汉语“上/下”在语法化程度上的深度与广度, 为其隐喻意义的多样化扩展提供了更为灵活的语言资源。例如:

(13) a. 他一见到那位教授, 便深深爱上了语言学这门学科。

b. 这件事你务必记下, 日后定有用处。

(14) a. The young researcher picked up the new methodology with remarkable ease.

b. The ancient temple eventually broke down due to years of neglect and seismic activity.

例(13a)中“爱上”已完全虚化为情感产生义, 例(13b)中“记下”中的“下”主要承担结果补语功能, 空间义已基本消失; 例(14a)中 picked up 虽已引申为“习得”, 但“向上捡起”的物理意象仍可感知, broke down 中的 down 仍保留“由直立到倒塌”的空间隐喻痕迹。这种语法化程度的差异, 使得汉语“上/下”在隐喻意义的抽象范围和衍生层次上较英语 up/down 更为丰富。

4.2. 文化认知模型对隐喻扩展的规约

认知语言学的文化模型理论认为, 语言使用者并非在真空中进行隐喻思维, 而是受到特定文化认知模型的深层规约[10]。所谓文化认知模型, 是指特定文化社群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关于世界、社会与自我的共享认知框架, 它规定了哪些经验领域是重要的、哪些价值取向是优先的, 从而间接影响了隐喻映射的选择与扩展方向。汉英两种语言在“上/下”隐喻义上的差异,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各自文化认知模型的不同侧重。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以儒家伦理为基底, 强调“礼”的秩序功能与“位”的规范意义。“礼”的核心在于“别异”——通过等级区分来维持社会秩序, 而“位”则是这一秩序的具象化表征。《论语·颜渊》中“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 ‘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 正是以各安其位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则。这种“重位崇上”的文化认知模型, 为汉语“上/下”由空间方位义向社会等级义和价值评价义扩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解释背景。需要指出的是, 文化因素并非直接、单向地决定词义变化, 而是通过制度实践、交际习惯和长期使用不断参与意义沉淀。前文所述“上流/下流”由空间位置义延伸至社会等级义和道德评价义的过程, 正体现了这种文化经验进入词汇语义结构的渐进机制。与此相似, “上级”“上峰”“皇上”等称谓中的“上”常与权力位置和等级关系相联系, 而“下人”“下贱”“下流”等表达中的“下”则在长期使用中逐渐形成从属、卑微或负面评价色彩。

西方文化传统虽同样存在垂直等级观念, 但其文化认知模型更侧重于个体成就、契约平等与职业分工。英语中 upward mobility、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rise through the ranks 等表达虽以垂直空间隐喻社会地位的提升, 但其语义焦点更多落在个体的努力、能力与职业路径上, 而非制度性的尊卑秩序。相较而言, 英语中这类以垂直方位直接指称国家权力运作和君臣礼制关系的固化表达不如汉语集中。在本文所考察的材料中, 英语 up/down 的社会地位隐喻更常与个体成就、职业晋升和组织层级相联系, 而汉语“上/下”则更集中地与传统权力结构和制度化等级关系相联系。由此可见, 不同文化认知模型并非直接决定隐喻意义, 而是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影响垂直方位隐喻的具体词汇化路径。

(15) a. 在中国传统礼制中, 臣子面君须行跪拜之礼, 上奏言事尤需谨守分寸。

b. 他出身卑微, 却不甘居于人下, 终以才学跻身士林。

(16) a. The CEO moved up to the top position through exceptional strategic vision, not family connections.

b. In Western societies, individuals are expected to work their way up through merit and perseverance, while those who fail to adapt may find themselves cast down to the margins of the labor market.

例(15)中“上奏”“居于人下”承载着中国传统“重位崇上”的文化认知模型，将空间上下与社会尊卑深度绑定；例(16)中 *moved up* 与 *work their way up* 从个体成就角度进行隐喻化表达，未如汉语般负载制度性的尊卑语义。英语中的社会地位隐喻更多地指向个人努力、才能与职业发展路径——*moved up* 强调个体凭借能力在组织中获得职位提升，*work their way up* 则侧重通过持续奋斗逐步改善社会地位的过程。相比之下，汉语“上朝”“上奏”“皇上”等表达中的“上”不仅是空间方位的隐喻化使用，更承载着传统礼制秩序中尊卑位分的制度性内涵。这种差异表明，共同的方位隐喻图式在进入具体社会结构时，必然受到各自历史文化制度的规约与重塑——英语的垂直隐喻更多地与“职业阶梯”“个人奋斗”的意象关联，而汉语的“上”则嵌入了儒家礼制与皇权体系的深厚文化积淀。

4.3. 历史社会制度对语义沉淀的塑造

文化认知模型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由特定历史社会制度在长时段演进中逐步塑造而成。前文关于“上流/下流”的分析表明，方位词的文化评价意义并非仅由共时隐喻映射产生，而是在长期语言使用中逐步积累和固化的结果。汉英两种语言在“上/下”与 *up/down* 隐喻义上的差异，也可以从不同历史社会制度所塑造的意义沉淀过程中得到进一步解释。

中国自秦朝确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以来，郡县制和科举制度在长时段历史中不断强化社会等级与政治身份之间的联系。这一制度经验将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与文化资本纳入相对稳定的垂直结构之中，使“上”更容易与权力、尊严和文化权威相联系，而“下”则更容易与从属、卑微和低位处境相联系。科举制度以“向上流动”为基本逻辑——读书人通过科考“升迁”入仕，从“下层”进入“上层”，这一制度性通道进一步强化了“上/下”与“尊/卑”之间的隐喻关联。“上级”“上司”“上峰”等制度性称谓的形成，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语言沉淀。

西方社会制度的演进路径则呈现出不同的格局。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虽同样存在严格的等级秩序，但城市自治、教会与王权的多元博弈、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兴起，使得社会结构呈现出相对多元的权力分布。现代英语中 *up/down* 在社会地位域的表达，更多受惠于工业革命以来的职业分层和公司制度，而非延续自封建等级的直接遗产。*Climb up the corporate ladder* 中的 *ladder* (阶梯) 隐喻虽仍遵循 *HIGH STATUS IS UP* 的基本图式，但其语义焦点是现代组织中的职位晋升，而非传统礼制中的尊卑序列。换言之，英语中虽然同样存在垂直的社会等级隐喻，但在本文所考察的 *up/down* 表达中，其制度性词汇化程度不如汉语“上朝”“上奏”“上级”“上峰”等表达集中。

(17) a. 科举及第者由此踏上仕途，得以上达天听，下抚黎民。

b. 明清时期，州县官员年终须上计于朝，考核优劣，定其升降。

(18) a. In medieval England, the king was ranked up above all nobles, while local lords were placed down below him, yet they maintained considerable autonomy in their own territories.

b. The modern corporate ladder encourages employees to move up through meritocratic advancement, while those who fail to adapt are gradually edged down the organizational hierarchy.

例(17a)和例(17b)中“上达天听”“上计”“升降”等表达承载了中国官僚制度对垂直隐喻的系统性塑造；例(18a)和例(18b)中 *ranked up...placed down* 与 *move up...edged down* 虽然遵循“高位为尊”的垂直图式，但英语的垂直隐喻更多用于描述空间中的相对位置(*ranked up above/placed down below*)或组织内部

的职位升降(move up...edged down), 并未像汉语那样围绕“上/下”发展出“上朝”“上计”“上达天听”这类直接嵌入国家权力运作流程的制度性固化称谓。中世纪英格兰的封建等级固然存在 up/down 的空间关系, 但这些方位表达并未沉淀为官职体系的专用术语; 而现代企业中的 move up/edged down 强调基于个人能力的逐级升降, 其隐喻指向的是职业阶梯而非尊卑秩序。因此, 尽管两种语言共享“高即为尊”的基本隐喻逻辑, 但从本文所举例证来看, 汉语“上/下”更容易在官职称谓、政治行为和等级关系中形成制度化表达, 而英语 up/down 更多用于描述相对位置、职业阶梯或组织层级。二者的差异并不意味着英语缺乏社会等级隐喻, 而是说明相同的垂直图式在不同历史制度和社会经验中会形成不同的词汇化路径。

4.4. 认知惯性与社会变迁的互动机制

隐喻系统的演变并非单向度的——既有的认知惯性(cognitive inertia)维持着隐喻模式的基本稳定, 而社会变迁则不断向隐喻系统注入新的经验内容, 推动其语义网络的动态调整。Hodgkinson 指出, 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 既有的认知框架仍可能表现出保持稳定、抵抗调整的倾向[15]。汉英“上/下”隐喻义的分化, 既是历史制度长期规约的沉淀结果, 也是两种语言社群面对现代社会变迁时不同认知路径的产物。

所谓认知惯性, 是指一个语言社群的隐喻系统在形成之后, 会以“认知惯习”(cognitive habitus)的形式代代相传, 成为母语者组织经验、理解世界的内在框架。Kögler 在讨论语言与惯习的关系时指出, 认知惯习建立在社会性习得的经验基础之上, 并影响个体理解、行动以及感知自身和周围环境的方式[16]。汉语“上尊下卑”的隐喻模式经历两千余年的使用与传承, 已经成为汉语母语者认知结构中高度固化的组成部分——即使现代中国社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们仍自然而然地使用“上级”“上层”“高尚”“下流”等表达, 其背后的认知惯习依然延续。同样, 英语 up/down 的隐喻系统也受制于其自身的认知惯习——一个个体成就取向和职业组织取向的垂直隐喻模式, 在现代英语中同样保持着稳定性和连续性。

然而, 认知惯性并非封闭的系统。社会变迁——技术进步、制度变革、文化接触——会不断产生新的经验领域和表达需求, 迫使隐喻系统做出适应性调整。在这一过程中, 不同语言社群往往沿着各自的认知惯习和历史轨迹, 对新经验进行不同的隐喻化处理。例如, 面对数字网络技术的兴起, 汉语基于“上”原有的“进入/登入”意象发展出“上网”“上线”“上云”等表达, 侧重将网络空间概念化为一个可“登上”的高处平台; 英语则基于 up/down 原有的“传输方向”意象发展出 upload/download, 同时借用容器图式发展出 online/offline, 二者走向了不同的认知路径。又如, 在公众关注度排序这一新兴领域, 汉语“上热搜”“上榜”延续了“上”固有的“上升至显要位置”的隐喻惯习, 而英语 trending up 虽方向一致, 但其表达方式与频率范围均有所差异。这种社会变迁中的路径分化, 恰恰反映了认知惯性与文化创新之间的持续互动, 具体表现为既有认知图式提供了理解新经验的认知框架, 而新经验又反过来不断拓展和调整既有的隐喻网络。例如:

- (19) a. 随着移动支付全面普及, 传统零售企业纷纷上云, 寻求数字化转型之路。
b. 该视频上线首日播放量即突破千万, 迅速登上各大平台推荐位。
- (20) a. The company decided to move up to the cloud, migrating all its historical data for better accessibility.
b. The hashtag quickly shot up to the top of trending lists across multiple platforms within hours.

例(19a)和例(19b)中“上云”与“上线”体现了汉语“上”在数字商业与网络传播领域的新兴扩展: “上云”将企业迁移至云端平台概念化为一种“向上登入”虚拟空间的行为, 延续了汉语“上”固有的“进入/登临高处场所”的空间化意象; “上线”则将内容发布至网络平台的过程同样概念化为垂直方向的上行运动。

例(20a)~例(20b)中 move up to the cloud 与 shot up 虽在方向上与汉语保持一致。业务向云端迁移、热

度向上攀升,但两种语言在隐喻扩展路径上呈现出细微差异:英语 move up to the cloud 中的 up 更多来自短语动词 move up 本身所携带的“向更优/更高层次转移”的抽象语义,而非将云端平台本身概念化为一个可供“登上”的高处实体;shot up 则侧重于热度值在统计走势上的快速上升,本质上是数量域 MORE IS UP 在数字传播领域的自然延伸。相较而言,汉语“上云”中的“上”更直接地将云端空间类比于可登临的高处场所,“上线”则内在地将网络平台视作一个“线”上可“上”的虚拟空间。二者共享垂直隐喻的基本认知逻辑,却沿着各自既有的认知惯习走向了不同的语义细化方向。

综合以上四个维度的分析,汉英“上/下”与 up/down 隐喻义的差异并非偶然,而是语言类型特征、文化认知模型、历史社会制度以及认知惯性与社会变迁互动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语言类型特征为差异提供了形式条件,汉语的分析性特征使“上/下”获得了更高的语法化程度和更广泛的抽象化空间;文化认知模型为差异提供了价值导向,“重位崇上”与“个体成就”分别引导了两种语言不同的映射侧重;历史制度为差异提供了内容沉淀——中国两千余年的官僚科举制度使“上尊下卑”的隐喻在相关表达中留下了较为明显的语义痕迹;认知惯性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则为差异提供了动态机制——既有的认知图式在面对新兴经验时表现出路径依赖和创新适应的双重特征。这四个层面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汉英“上/下”隐喻义差异的深层认知动因网络,也为理解语言、认知与文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案例说明。

5. 结语

本研究以概念隐喻理论和意象图式理论为框架,系统考察了汉英“上/下”与 up/down 的隐喻映射模式,揭示了两者在共性、差异及其认知动因三个层面的深层特征。研究发现,两种语言在映射方向、目标域覆盖、系统层级及语义扩展等方面呈现出高度一致性,根植于人类共同的身体经验与垂直图式;与此同时,两者在社会文化规约、道德评价体系、语法化程度及新兴领域扩展路径上表现出显著分化,这些差异可归因于语言类型特征、文化认知模型、历史社会制度以及认知惯性与社会变迁互动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共性印证了具身认知的普遍性根基,差异则揭示了文化认知对隐喻建构的深层规约。汉英垂直方位隐喻的异同并非偶然的语言表象,而是人类基本认知图式在不同文化语境中适应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具身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在语言层面的辩证统一。这一发现不仅为概念隐喻理论提供了跨语言的实证支撑,也深化了我们对语言、认知与文化之间复杂互动机制的理解,为认知语言学领域的汉英对比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启示。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3] 蓝纯. 从认知角度看汉语和英语的空间隐喻[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 [4] 肖家燕. 优先概念化与隐喻的翻译研究——《红楼梦》“上-下”空间隐喻的英译策略及差额翻译[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4): 105-109.
- [5] 刘晓宇, 刘永兵. 英汉上下空间概念的隐喻——基于语料库的比较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6, 24(1): 7-11.
- [6] Yu, N. (1998)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7] Johnson, M.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177847.001.0001>
- [8] Grady, J.E. (1997) *Foundations of Meaning: Primary Metaphors and Primary Scene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9] Boers, F. (1996) *Spatial Prepositions and Metaphor*. Gunter Narr Verlag.

-
- [10] Kövecses, Z. (2005) *Metaphor in 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14408>
 - [11] Schubert, T.W. (2005) Your Highness: Vertical Positions as Perceptual Symbols of Pow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9**, 1-21.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9.1.1>
 - [12] Boroditsky, L. (2001) Does Language Shape Thought? Mandarin and English Speakers' Conceptions of Time. *Cognitive Psychology*, **43**, 1-22. <https://doi.org/10.1006/cogp.2001.0748>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第7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14] Huang, S.M. and Hsieh, S.C.Y. (2008) Grammaticalization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in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 49-68.
 - [15] Hodgkinson, G.P. (1997) Cognitive Inertia in a Turbulent Market: The Case of UK Residential Estate Agen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34**, 921-945. <https://doi.org/10.1111/1467-6486.00078>
 - [16] Kögler, H.-H. (2011) Overcoming Semiotic Structuralism: Language and Habitus in Bourdieu. In: Susen, S. and Turner, B.S., Eds., *The Legacy of Pierre Bourdieu*, Anthem Press, 271-300. <https://doi.org/10.7135/upo9780857289278.013>